

媒介文化与中国女性的媒介再现： 以《纽约时报》为例

李敏

摘要：媒介在文本生产中总是在客观性和倾向性之间求得平衡，专业主义理念是保证报道客观性的圭臬，但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对负面消息的偏爱又使它们更容易关注负面新闻。文章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媒介文化的这种矛盾性对中国女性媒介形象的影响，发现媒介以复杂的态度呈现中国女性，一方面以客观的手法避免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着对异族女性的偏见及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使人物呈现负面的形象。

关键词：媒介文化；女性形象；《纽约时报》；再现

作者简介：李敏，女，讲师，博士。（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3) 06-0058-04

中国女性在西方媒介的涉华报道中是一个重要的被再现的群体，是构成中国国家和民族形象的重要符号资源。西方媒介通常都声明禁止刊发具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色彩的内容，这为媒体客观地塑造中国女性形象设置了操作理念。但媒介从来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运作，报道内容和风格会受到包括传播政策、社会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外界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媒介内部权力结构、传播者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如果说外在环境不断变化，媒介需要不断调整传播策略以保证其生存空间的话，媒介文化则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体现着媒介自身质的规定性，对其内容生产的影响也更持久。本文试以《纽约时报》为例分析媒介文化对中国女性媒介再现的影响，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媒介涉华报道的规律。

一、专业主义理念与禁止性别和种族歧视

新闻专业主义源于西方新闻工作实践遵循的一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1]在新闻实践中，秉承此一原则的新闻业界逐渐发展出一种“专业主义精神”。在这里，“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概念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它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①建立于此种价值体系之上的新闻行业逐渐发展成一个

^① 一些学者仍旧对新闻业是否已成专业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新闻工作者不需要像医生和律师那样要领取从业执照；新闻行业的自律不如医疗和法律等行业那么强烈，机制也不那么完善（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Johnstone et al,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6: 97-112）。参阅，陆晔、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 新闻学研究，总71期。不过，这一套行规已经成为衡量并规范业务实践行为的主要准则。

“专业”。

《纽约时报》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成形有极为密切的渊源。该报创始人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对《纽约时报》的定位是：成为高格调可以长久经营的报纸，以“道德精神”和“保守主义”为前提，客观公正，并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以告知读者新闻事件的缘由及可能发展的趋势。在国外新闻的报道上，雷蒙德尤其注意使其不偏向美国自身的观点。^[2]后来收购《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也不走煽情主义的道路，他提出的报道原则是：力求保证报纸以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使《纽约时报》成为探讨一切与公众有关的重大问题的论坛，并为此目的而邀请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参与明智的讨论。^[3]以上理念都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最核心的实质。落实到具体操作上，这一理念体现为词汇的选择、议题的安排、信源的使用等方面的公正和平衡。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纽约时报》才得以在美国媒体和社会结构中确立不可替代的地位，能够“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并给其他媒体设置议程^[4]。与专业主义理念相适应，《纽约时报》制定了独特的“新闻政策”，其中就包括禁止对少数族群和女性的歧视，比如：新闻报道不得特别指出当事人的种族、宗教及经济、文化背景，除非明显与新闻有直接关系；新闻报道也不能对女性有所歧视与侮辱，等等。

笔者搜集了2000年至2010年《纽约时报》中涉及中国女性的报道，共得样本601篇，并对这些样本中信源的采用、人物行为的描述以及文本中对人物性格的描述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报对中国女性性格特质的描述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勤劳”（占有特质描述总量的26.1%、文章总数的42.5%）、“积极主动”（占有特质描述总量的18.8%、文章总数的30.7%）和“果敢坚强”（占有特质描述总量的18.0%、文章总数的29.3%）；而“多愁善感”（占有特质描述的0.4%）和“懒惰”（占有特质描述的0.1%）分别排在最后两位。这组数据说明，《纽约时报》倾向于将中国女性描述为具有正面特质的群体。

在对消息源的引用上，601篇样本中有306篇没有引用来自女性的消息，占样本总数的50.9%；295篇将女性作为消息来源，其中有230篇直接引用，占样本总数的38.3%，有65篇间接引用，占样本总数的10.8%。由于可以被引用的消息源通常被视为具有一定权威性，因而如何引用消息源除了能够说明报道是否客观，从社会性别角度看还可以推测媒介如何认定女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而女性能否通过媒介“说话”也标志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媒介中被“遮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失去话语权或表达机会。本文得出的这一数据说明，《纽约时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中国女性具有权威性或者判断力，并赋予她们表达的权利。

可以明确判断人物行为结果的报道一共有478篇。其中有245篇对行为结果的描述是明显正向的（获得成功、获得帮助、帮助他人），明显负向效果的一共有180篇（遭受损伤、伤害他人、未成功、被处罚）。这组数据说明该报能够较为充分地关注到中国女性的正面行为。

以上几组数据说明《纽约时报》关注到中国女性的积极正面的特质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刻意凸显对中国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在一些微观语义层面上的修辞却也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见。以人物专稿和讣告为例，在2000年至2010年的样本中，共有关于宋美龄、卓琳的两篇讣告，有华裔政治家赵小兰，演员张曼玉、刘玉玲、黄柳霜，李安的妻子林珍等人物专稿23篇。在以上这些专门论及中国女性的文章中，大部分对已婚女性的描述都刻意关注到她们的家庭生活，显示出该报对中国女性的性别偏见和东方化倾向。

二、政治上的保守性与“他者化”的中国女性

在美国，媒介身处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亲近某个党派从而在报

道中流露出好感,甚或进行大规模报道以支持其竞选和其他政务活动是媒介中常有之事。《纽约时报》也有明确的党派立场。《读报》的创刊人雷蒙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自其协助组织共和党之后,《读报》一直亲共和党。不过在1884年,该报的第二任发行人乔治·琼斯反对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布雷恩(James G. Blane),这之后《纽约时报》政治立场发生转变^[5],开始拥护民主党。

不过,无论具体立场如何,从整个产业的本质上来说,美国的媒介仍旧是保守的。它们身处政治、各利益集团以及其他各种权力系统中间,不得不在这些权力结构和自身利益、专业理念中求得平衡,也可以说,为生存计,无论亲近哪个党派都得与政府保持微妙的关系,以维持其影响力和生存空间。这样做的后果是,大部分媒介会维持既有的社会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尽管《纽约时报》的目的是要“给读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形成自己的想法”^[6],它也试图采用各种方式将这一理念操作化,但关于它是否真正不偏不倚依旧众说纷纭。另有一些研究也显示在涉及到美国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事件上,《纽约时报》的报道会与政府保持一致,而不像它一直强调的客观公正。譬如,在海湾战争这一问题上,《纽约时报》不时表现出某种摇摆的态度,最终演变为对发动战争的支持。布莱恩·迈克尔·戈斯在分析该报对美国制裁伊拉克的报道时指出,《纽约时报》的报道采用了“个人化”的手法,即将针对伊拉克这一国家进行的制裁转换为针对萨达姆个人的制裁,并且总是紧密追随美国政府的主张,避免报道涉及伊拉克难民及其制裁造成的严重后果,即使有涉及此方面的报道,也是轻描淡写。^[7]

这种政治上的保守性落实到具体的文本生产过程中则表现为一种“以我为主”的叙事逻辑,即将美国利益和根本的价值观,尤其是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的精神概念,作为呈现报道对象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将与美国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视为“他者”。在呈现中国女性的过程中,这种“他者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即“邪恶的”女性和“被救赎”的女性。“邪恶的”女性是不同于美国价值观念和威胁美国利益的人物,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宋美龄。关于宋美龄的讣告在描述宋美龄的美貌聪明的同时特别强调她的权力欲、凶残、贪婪,(Loves power, eats up publicity and flattery, pretty weak on her history, corrupt, power-hungry^[8]。)“被救赎”的女性则是非民主体制的受害者,通常被描写为中国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宗教、民族等特殊议题的文章中,这些女性呈现出被动、无辜、无力的形象。在2006年5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了一位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而偷渡到美国的女性的遭遇。^[9]文章描述了她在接受采访时的恐惧:who asked to be identified only by her nickname, Tracy, because she fears retaliation(该名女子害怕被遣返而请求报道时使用化名“翠西”。)Tracy said. “I couldn't go back to China.”(翠西说,“我很害怕,我不能回中国。”)

在这类描述中,中国女性的呈现基本上体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即维护美国既存体制的合法性,而它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则更像是力求保证“道德上的清高与平衡”的一种手法。因此,尽管《纽约时报》被视为自由派的报纸,但总体态度依旧是保守的,它代表的是“非正式的华府态度”,在涉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报道时带有一些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导致它在报道中国女性的时候遵循美国主流政治观的框架,以美国利益为中心,流露出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三、对负面消息的偏爱与被贬抑的中国女性

媒体偏爱负面信息,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受众的好奇心,否则就有可能流失掉很多受众,比如,PBS就曾经由于强调报道质量和正面消息导致收视率低于5%。^[10]另一方面,媒体认为揭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尽力引导社会进行改革能够发挥“看门狗”的功能,所以报道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否关注负面信息,更在于其目的如何,在于能否客观地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观念已经渗透到选择新闻事件和制作新闻报道的各个环节。

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纽约时报》在涉及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持不同政见者、疾病等方面的题材上常常出现负面报道,而在这类报道中出现的女性大多是被“贬抑”的对象,尤其是遭受制度性贬抑的弱者。对此,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的伊丽莎白做出过这样的解释:“我的目的不是提出批评,我的目的是提出真正的问题。”^[11]比如,在谈到为何以负面形式呈现艾滋病主题时,伊丽莎白说,“也有人说这是批评文章,这是负面报道,可是我想应该提出来,告诉大家这些农民得了病。我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没办法让别人听到他们声音的人,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11]事实上,美国媒介对美国的报道也有很多负面消息,美国人对此也心怀不满。但这种负面消息不同于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由于美国人并不了解也不能亲身验证中国现状,媒介报道的强化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尽管《时报》声称一直在适时地协调正面和负面的文章,但对中国一些公众来说,这些负面报道仍旧占据了太多的篇幅。^[11]

四、结 语

早在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就将少数族裔的报道定义为道德问题,《纽约时报》提出的民主社会中新闻社会责任的5个标准中也包括“媒体也必须是公共论坛,必须无偏见地呈现社会各族群之形象^[12]”这一准则。尽管如此,媒介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与专业主义追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一直存在,而媒介偏爱负面消息的本性又使负面事件更容易受到关注,这都影响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女性的报道,使中国女性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象体系。对我们而言,也就不能简单地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是/非、对/错、客观/偏见的评价,而是要更深入地考察媒介自身定位、编辑部内部权力结构及其政治理念等各种要素,以更好地总结出媒介文本生产的规律。

参考文献:

- [1]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北),总71:17-59.
- [2]邵满春.《纽约时报》的家族经营史[J].青年记者,2007(5).
- [3][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7.
- [4][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64.
- [5][美]Meyer? Berger. 纽约时报一百年[M].何毓衡译.台北:新闻天地出版社,1963:11.
- [6]江卉,徐金.《纽约时报》的新闻理念[J].采写编,2009(2).
- [7]Brain Michael Gos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Iraqi People": The Sanctions Regime against Iraq in the *New York Times* (1996-1998) [M]. University of Saint Louis, Madrid Campus, Spain, *Journalism Studies*, 2002(1): 83-99.
- [8]Faison, 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 Power in Husband's China and Abroad, Dies at 105 [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03.
- [9]Julia, C. Mead A Slow War on Human Trafficking[N]. *New York Times*, May 28, 2006.
- [10]Whetmore, E. J. *Media America, Media world: Form, Content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M].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3:194.
- [11]刘燕.“好记者”首先是个“好听者”[J].新闻记者,2002(9).
- [12]胡兴荣.新闻自律与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要求[J].新闻界,2004(5).